

主持人语

今年5月，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和“令和时代”的开启不仅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大反响，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明仁天皇主动提出生前退位后，安倍政权给予积极配合，迅速通过特例法，并在退位与即位的过程中大力渲染。可以看出，天皇与天皇制在日本社会乃至政治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自民党及其政府期望借助其权威性在提高执政合法性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有必要对天皇制的历史演变、天皇制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国民性与天皇制、天皇制的社会及政治外交功能等课题进行学术性探讨。

此次工作坊汇聚了国内外10余名日本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家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日本前宫内厅主任研究员、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副教授真边美佐认为，社会大众对天皇的认识开始从重视“血统”变为更重视“机能”。天皇的权威不是来自历史，而是受到天皇个人品行的左右，因而进入了一种不稳定的时代。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松本郁代指出，天皇的正统性依据经常发生历史性变迁，前近代是作为佛对神的祭祀，近代为国家神道及《大日本帝国宪法》，现代为《日本国宪法》。还有学者认为，从战后日本的政治过程来看，天皇通过“内奏”、“御下问”的形式在政治领域仍具有较大影响力，除天皇自身因素外，更多的是保守政治家及其执政党的原因，例如明仁天皇“保卫宪法”与令和天皇“遵照宪法”的即位致辞反映了安倍政权修宪的意图。

经过一整天的发言和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天皇对日本

的政治过程甚至决策过程仍具有影响力；天皇在日本社会中受到日本国民的爱戴；可以通过天皇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比如邀请天皇访华等。

总体上看，安倍政权通过公共传播大肆渲染包括宣布新年号在内的退位与即位具体过程，强化了天皇与天皇制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借助天皇权威稳定政权，实现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目标。

王新生

2019年6月16日

博雅工作坊第 20 工作间

“令和时代”：天皇制的前世今生

2019 年 6 月 10 日

本期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发起，邀请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日本法政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1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他表示，许多中国人基于本国的历史经验往往会对日本天皇和天皇制产生误解，但事实上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皇帝大一统制度差别甚大。因此，本次工作坊的目的是在令和时代开启之际，通过对日本天皇制的讨论，进而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王新生教授表示，日本的天皇与中国的皇帝尽管十分类似，但性质上却非常不同，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日本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还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上，因此认识真正的天皇是了解真实日本的必由之路。

日本前宫内厅主任研究员、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副教授真边美佐首先发言，主题是《战后的天皇与日本社会》。真边美佐表示，日本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因此，如果失去了国民的整体意志，或者

说得不到国民的理解，天皇就失去了其现有的地位；与此同时，宪法第二条规定，“皇位世袭，根据国会决议的皇室典范之规定继承”。其中皇室典范与普通法律一样，是由战后国会制定的，但修改皇室典范的权力在国民，因此总体而言，与二战前的天皇不同，现在天皇的存在是建立在国民理解之上的。

昭和天皇作为横跨二战前后的天皇，其地位值得思考。昭和天皇是依据明治宪法即位的，并在明治宪法下作为日本国的君主而君临天下，发布开战诏书从而使战争开始，并且发布终战诏书，从而让战争结束。战后初期，尽管新宪法强调天皇的存在是基于国民的理解，但是大多数国民毫无批判地支持天皇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转变。1973 年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在当时国民的心中，天皇制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不加批判被接受的事。

另一方面，昭和天皇对日本国宪法的接受也值得关注。从 1975 年对昭和天皇的一段采访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无论是在明治宪法下，还是在日本国宪法下，在遵守宪法这一点上，自己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从天皇的这种姿态中，并不能看到所谓天皇这一地位如何为国民所接受，也难以看到昭和天皇积极满足国民期待、做好“象征天皇”的强烈意识。

与昭和天皇不同，明仁天皇则强烈地意识到国民理解对天皇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天皇必须接受国民的要求，因此明仁天皇开始有意识地摸索“象征天皇”的应有状态，并通过向战死者的慰灵之旅，以及对地震、火山、台风等受灾者慰问的形式表现出来。天皇的这种姿态也让一般民众对其产生

尊敬之感。

平成时代的天皇之所以试图摸索“象征天皇”的应有状态，是因为战后国民针对皇室的批判和直率的意见，通过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公开表现出来，这些观点对皇太子时代的明仁天皇形成冲击，而在昭和天皇担任皇太子时则没有这种情况。总而言之，平成时代天皇对理想状态的摸索最终被大多数国民接纳，但事实上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明仁天皇个人的品行而非体制的确立。另一方面，从大多数国民对女性天皇的认可态度看，社会大众对天皇的认识开始从重视“血统”变为更重视“机能”。换言之，如果天皇采取了与国民期待不同的行动，将招致国民对天皇的进一步反感，甚至发展为推翻皇室的行动。这种情况意味着日本国宪法在名与实上都开始发挥作用，也意味着天皇和皇室真正进入了始终置于国民目光之下的严峻时代。另外，这也反映出天皇制的改变，即天皇的权威不是来自历史，而是受到天皇个人品行的左右，由此天皇制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代。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松本郁代的发言主题是《中世日本天皇的正统性与即位礼仪》。

松本郁代以中世日本天皇的即位仪式为中心，考察了日本天皇正统性的获得及其与东亚佛教的关联问题。天皇的正统性大多以天皇与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之间的血缘关系来证明，但这种正统性的根据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前近代是祭祀，近代是国家神道及《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现代是《日本国宪法》。正是在这种历史变迁中，天皇的正统性在即位礼仪之中得以形成。

日本天皇的即位仪式是由《神祇令》践祚条及大尝祭条中的内容规定的。据此，践祚之天皇，由公开继承皇位的登基大典（包含践祚仪）与大尝祭所构成。从天应元年（781年）即位的恒武天皇开始，以从先帝继承皇位的三件神器之授受为“践祚”，以公开继承皇位为“即位”，并分别在不同的日子举行。而登基大典的礼仪形式据说是模仿中国的元旦朝贺式，沿袭了唐朝的礼仪模式穿着“衮冕十二章”。尽管“衮冕十二章”与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息息相关，但是天皇对国土支配的正统性是基于以天照大神为皇祖神的神话，因此天皇在登基大典上穿着“衮冕十二章”，只是出于加强自身权威的想法，而非天命思想。另一方面，大尝祭（天皇即位之年首次举行的新尝祭）也是天皇即位仪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在大尝祭中，天皇会举行对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供奉稻谷（粟），以及从各地采来的贄（鱼贝、果实等）的所谓“神膳供进”的仪式。之后，天皇通过与神一起亲切地闻食，以此来确认其乃将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作为祖先的“天孙”。

即位仪式与当时东亚的国际秩序息息相关。即位礼仪被作为制度得以确立是在7世纪末至8世纪的天武、持统朝。这一时期，正值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天皇的中央集权化得以发展。与此同时，日本意识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秩序的存在，并在与中国的接触中产生了本国意识，开始寻求自身的国家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既是东亚世界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外交手段，因此伴随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日本创立了意图“镇护国家”的“国家佛教”。佛教中的护国思想及国王守护增强了天皇权威，加强了天皇与

佛教之间的关联，进而产生了天皇成佛的思想。由此 10 世纪以来的皇位继承仪式逐渐在制度层面趋向稳定，皇位的正统性依据以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与作为天孙的天皇之间的血缘关系来保证。围绕皇祖神的意识形态是支撑朝廷政治的支柱，所以即便没有政治权力，天皇也无法被否定。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从 11 世纪开始被解释为大日如来，这反映了佛教影响的不断加强，乃至在之后的登基大典中出现了佛教化的灌顶仪式，并通过僧侣对此仪式加以解释，形成《即位法》的即位理念。在佛教的影响下，中世天皇参加大尝祭的仪式也发生改变，通过修行登基大典中的即位灌顶，获得了天照大神本地大日如来的身体。天皇作为天照大神本地之佛参加神事，既是继承琼琼杵尊的天孙，又作为本地大日如来与天照大神合体。总而言之，通过即位仪式和大尝祭，在佛教意识形态以及王权护持思想的影响下，作为天尊的天皇成为了佛，拥有了神话与佛教的双重正统性。明治天皇的即位仪式与之前不同，不仅清除了佛教思想和中国因素的影响，还别出心裁地在登基大典会场安置“大地球仪”，寓意将地图之中所描述的日本版图交由天皇来继承。这种基于现实地理的世界认识，与中世形成的佛教世界观完全不同。

回顾天皇即位仪式的发展，可以发现在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正统性所在与根据，其发展脉络首先是皇祖神天照大神作为本地佛登场，中世转变为天皇亦神亦佛的存在，近代则彻底对此进行了否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对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感情变化进行了解析。他表示，从国民性的角

度分析，日本人对天皇制和天皇的感情是其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支持与对天皇的亲密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在二战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支持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天皇功能性的需求，以及对天皇个人的亲密感和对天皇个人品行等方面的情感。日本国民对天皇制的支持率一直很高，但对天皇的亲近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异，比如民众对昭和天皇的亲近感远不如之后的明仁天皇和现在的德仁天皇。另外对天皇的亲近感也存在年龄段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皇的感情也会增长，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对天皇尊敬的感情很高，表明“天皇是神”的思想仍存留在一部分日本人的心中。不过，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年轻人对天皇漠不关心，因为很多人在年轻时不会考虑自己的生活 and 天皇的关系，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思考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时，自然会与天皇联系起来，其对天皇的感情也会与之前大不同。这种变化正是日本人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张建立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感情上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昭和天皇时期发布了《人间宣言》，表明自己不是神而是人，之后明仁天皇和德仁天皇都娶平民为妻，进一步打破了民众对天皇神性的传统认知。除此之外，明仁天皇和皇后在灾害慰问中平易近人的表现进一步拉近了天皇与民众的距离，增加了民众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德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太子时期就有意拉近自己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打破自身的天皇威严，这对提升民众对自身的亲近感十分重要。正是在这

种感情变化中，一代代日本人不断完成了自身的感情变化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的发言聚焦《皇室典范》的制定及修改前景。她指出，《皇室典范》对日本天皇制和皇室具有重大影响。在《皇室典范》的束缚下，日本皇位继承后继乏人的现象愈发严重，这一方面源于日本近年来的少子化趋势，另一方面也与《皇室典范》对皇室的约束和对皇室女性的规定有关。

《皇室典范》是日本制定的以皇位继承为核心内容的法律。现行的《皇室典范》虽然是在1947年依据日本国宪法制定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明治时期制定的《皇室典范》。明治时期之所以要制定《皇室典范》，主要是因为明治之前的日本皇位继承毫无制度可言，为了改变皇位继承的无序状态，明治时期对此进行了规范。经过明治维新元老考察和商讨，《皇室典范》确立了皇位由皇统男系男子继承、排除女性和否定退位的规定。此后，日本皇室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皇位继承也摆脱了之前的混乱状态。然而，排除女性、否定退位的规定也给之后天皇制的发展带来了麻烦，使得明仁天皇退位和未来皇室继承遭遇困难。

战后的《皇室典范》于1947年1月6日公布，同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开始实施，原本与《日本帝国宪法》同格的《皇室典范》成为了《日本国宪法》的下位法，这不仅使皇室自律主义被否定，皇室规模也被缩小。比如二战前的51个皇室成员到1947年只剩下15个，直至2019年也只有18个。尽管战后的《皇室典范》删除了大量军国主义内

容，称得上是一大进步，但由于其与明治时期的《皇室典范》一脉相承，时至今日难免造成皇室和时代的脱节。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皇室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但由于《皇室典范》坚持不对男系男子继承的规定进行修改，导致女性继承皇位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为外界所诟病。

对于《皇室典范》的修改前景，李卓认为，尽管目前德仁天皇即位、悠仁亲王出生都使皇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室后继乏人的问题。而日本宪法规定，对《皇室典范》的修改必须由国会完成，但目前日本国内外并不存在推动政府及政治人士对其进行修改的压力，由此日本女性天皇的出现或将是遥遥无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的发言主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神道三论”的继承与变异》。他从神道的角度阐述了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问题。

神道可概括为“神道三论”，即神国论、皇国论和武国论。其中神国论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日本的国土是神创造的，另一方面是指日本始终受到神的保护。神国论的观点从平安时代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不断继承与发展。皇国论是由神国论衍生而来，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君权神授，天皇的权力来自“天照大神”；二是天皇统治“万世一系”。上述观点主要来源于《日本书纪》、江户国学以及后期的水户学、经世学。总体而言，神国论立足于神世，皇国论立足于人世。武国论也是日本重要的立国之基。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据传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用“天琼矛”探海，海水滴起来就变成日本第一块国土，由此表明日本是以武立国。与神道三

论相对应的是三件神器：镜是天照大神的象征，代表智慧；玉是天皇的象征，代表仁德；剑是武力的象征。

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神道三论”息息相关。据史书记载，邪马台国时期，卑弥呼（当时的女王）“事鬼道，能惑众”，凭借神鬼之道统治国家。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神道，但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神化王权的政治需求。之后的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和文武天皇通过进一步神化王权，不断强化古代天皇制，直到近代，天皇制真正走向鼎盛，在《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乃至日本宪法中都能看到神道三论的印记，强调日本是一个皇国，以及军事立国的思想。

另一方面，战后民主改革与“神道三论”的变异与延续也密切相关。战后民主改革并不是全盘否定明治维新的成果，而是重申了明治维新时期“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精神，并进一步去除了明治宪法中天皇国体论和天皇神格建国的思想。由此天皇制由战前的天皇总揽统治权变成了象征性天皇制。与此同时，神道三论也随之发生变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皇统在暧昧的表述中得以延续，将神武天皇的传说当成事实对待；第二，皇位更替时继续延用有神道意味的仪式，继续神化新即位的天皇；第三，神器与天皇神性的隐约关联仍然存在。

宋成有认为，神道三论之所以与传统天皇制密不可分，是因为神道意识的载体依然存在。一是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和天皇制，由此神道意识有了赖以生存的依据；二是伊势神宫、靖国神社以及各种各样神社的存在使神道精神魂有所归。尽管战后日本实施了政教分离，但“神道三论”也随之发生了

适应性的变异，继续作为象征性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不言自明的意会之中。此外，国民心态和性格也是造成这种关联的重要原因。神道反映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和意识的自我认知，成为日本民族心灵的故乡，“神道三论”也成为进入故乡的一把钥匙。最后，日本社会生活离不开神道理念。当代日本社会中很多领域神道依然活跃，比如大企业的经济活动，普通人的升学考、结婚仪式等都要祈福神灵，日常行为无形中深化了神道理念。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新国家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膨胀，神道得到了更大力量的支持。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娜的发言题目是《从近代天皇制到象征天皇制》。她表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复辟了皇权，建立了近代天皇制。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国民主权，天皇基于国民情感成为象征。在象征天皇制下，虽然皇权被封印，但天皇制传统仍在断裂中延续，国民与天皇的情感依然具有连带性。

日本在制定明治宪法时为了避免天皇被卷入政治，没有采取天皇亲政的形式，而是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明治宪政体制。这一体制从结构上看存在两个双重构造：一是政治体制上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结构，即以天皇为中心，实现体制内外各机构的权力平衡，从而实施天皇的绝对统治权以及权威的委托制；二是国体与立宪并存，使天皇制具有权力和情感双重支配的原理。明治政治为了维系民心通过实施《皇室典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以国体论构筑皇权的权威，在伦理情感层面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明治时期由于明治元勋依旧健在，加之明治天皇的个人魅力，

明治宪政体制在运作上基本顺畅，即使是政党政治出现之后依然能够通过合作控制政局。

一战之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天皇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制度困境，一战后许多君主制帝国灭亡，而大正天皇又不能理政，因此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民众政治迅猛发展，天皇制危机四伏；二是权力困境，出现政府与军部之间争权夺势的困局；三是思想困境，随着一战后世界大势的变化，皇室价值逐渐下降；四是社会困境，裕仁天皇摄政时期社会状况糟糕，关东大地震和一系列暗杀事件使得民众开始质疑天皇。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天皇制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一是国体论发生改变。首先国体论的逻辑结构发生改变，以混合民族论取代单一民族论，这是为了宣扬殖民地民族同化；其次国体论成为禁忌，内涵日趋狭窄；最后国体论被极端势力利用，其重心由思想理论转变为排斥异己的打压工具。二是皇权的重塑与天皇制的强化。首先皇室形象发生改变，通过一系列舆论宣传，争取民众对天皇制的支持；其次是与民主主义融合，在此基础上向国民灌输天皇家长制政治思想，为民众参政提供正当性的同时强化天皇的权威；最后是恢复神权政治，从1928年1月开始日本举行了长达一年的登基庆典活动，在一系列的宣传和包装下，裕仁成功将自己打造为具备领袖气质的新天皇，是与神合为一体的全体国民的父母。三是军部天皇制的转向。天皇对军部扩大权力的行为采取放任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其中。于是昭和时期军部在近代天皇制的框架内，通过合法手段，以间接统治形式实现了政治

诉求。四是大本营和御前会议的设立。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随着大本营和御前会议的出现，近代天皇制在体制上一定程度突破了明治宪法的约束。

近代天皇制在改变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变。首先是日本对坚持国体及坚持天皇制的认识从未动摇，民主运动指向的矛头是藩阀政治、贵族政治，而不是天皇制本身。其次，“天皇不亲政”的体制从未改变。正是在变与不变中，近代天皇制最终走向专制，直到崩溃。

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国民主权，天皇基于国民情感成为象征，但是天皇制的传统仍在断裂中延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象征天皇制的构建过程中昭和天皇守护了天皇制本身，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也由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第二，日本政府在有限的条件下从制度、理论、情感三个方面为天皇制的延续做了最大的努力，从而使天皇制的存续建立在国民意愿的基础上。第三，通过行动和舆论影响，天皇及皇室形象逐渐发生转变，昭和天皇从威严的、具有家长式权威并被神秘化的天皇转变为能为普通人亲切感知的非宗教的天皇。第四，天皇制从绝对主义天皇制走向大众天皇制，这一过程是以 1959 年明仁皇太子与平民正田美智子结婚为转折点，出现了大众天皇制为特征的社会热潮。

天皇制虽然在制度层面呈现断裂之势，但也有一些方面得到延续：首先，国体论被部分保留，天皇在政治外交上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天皇权威继续被国民所承认，比如现在每年仍有数十万国民自发聚集在皇宫周围进行参贺；最后，天皇制文化得到延续，并渗透在日本国民生活的

各种细节之中。

总之，近代以来天皇制无论是作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制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明仁天皇生前退位打破了明治以来的规定，天皇制出现新的转向，而德仁天皇作为战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与神权天皇制完全隔绝的第三代象征天皇，未来皇室的活动方式也许会出现更彻底的改变。

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教授王敏对新天皇即位后的中日关系发展进行了分析。

令和时代的到来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就像迎接新年，而在新天皇即位后，他也成为了日本民间和国内外媒体报道中称赞的对象，广受欢迎。与此同时，皇室对外展现出的透明度更高了，比如天皇抱着爱子的照片多次出现在媒体上，这是从未有过的。这也表明，现在的皇室已开始逐渐从神圣不可及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平民中间，这之中如果没有安倍政府的支持及宫内厅的允许，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反映出面对时代的变化，日本已经感受到需要作出改变。

在这样一种“令和革命”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也出现了新气象。天皇和皇后接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夫妇，之后又用华丽的马车接受了新大使的国书，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令和时代的中日关系中地位有所上升，在德仁天皇的国际视野中，中国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王敏认为，今后德仁天皇对中国的关注会涉及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与水运史相关的研究。日本从古至今水灾不断，治水的迫切性及灾难带来的伤害使得日本的历代天皇都

以治水为己任。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治水天皇—继体天皇，就是以中国大禹作为自己的楷模。在日本京都御所天皇办公室中有一幅巨大的画，当中的人物就是治水的大禹，自 1641 年以来，有 38 位天皇都曾在这里办公，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要像大禹一样为民解忧。

在日本，与大禹相关的遗迹超过 140 处，从北海道到冲绳，遍布日本全国。实际上，大禹和年号“平成”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平成”出于《尚书》中的“地平天成”，而在大禹陵所在地绍兴，乾隆皇帝曾在禹王庙的屋檐上手书“地平天成”，反映出中国皇帝对和平盛世的理念，而“平成”成为日本的一个年号，也映射出日本天皇对未来的期许。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梦和日本梦联系在了一起。

王敏表示，新天皇即位后继承了明仁天皇的和平理念，肩负着重大责任，相信在共同拥有的汉字文化平台和有志之士的支持下，他会继承父辈的事业，进行新的“革命”，同时推动中日关系世代友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的发言题目是《战后昭和天皇的政治影响力》。他认为，战后的昭和天皇没有任何国权行为似乎是一个共识，因为这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但从实际政治过程看，天皇通过内奏、御下问等形式仍发挥着影响力，其中既有昭和天皇自身的因素，更多来自于保守政治家及执政党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三条明文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但实际上，昭和天皇在战后仍发挥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主

要通过内奏和御下问两种形式。内奏是内阁首相包括其他内阁成员和官员向天皇进行汇报，御下问则是天皇亲自对官员提出一些问题。在战后初期，昭和天皇曾通过上述方式就许多国内外的问题向内阁了解情况。

战后初期，革新政党希望加快推进象征天皇制，最突出的是芦田均内阁。芦田均认为，为了皇室和日本整体的考虑，新宪法实施后，天皇过多地介入政治和外交的事务未必是一件好事。为此，他提出废除内奏、更换侍从长等措施，但遭到了天皇的强烈反对。1947年7月22日，芦田均在其日记中记载，在当天的内奏中，天皇的御下问长达30分钟，涉及问题包括美苏对立及冷战等。虽然芦田均是坚定的象征天皇制的推动者，但其政治生涯却很短。之后，保守派代表吉田茂组阁，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认为推进以天皇为中心的国民整合符合日本国宪法精神。上台之后，他恢复了所有内阁成员内奏的制度。

保守派政治家的代表还有佐藤荣作，他是日本迄今为止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执政期间，他不断推动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其与内阁成员内奏接连不断，同时利用天皇御下问的形式，借天皇之口说出对保守党非常有利的話。佐藤荣作对于这种和天皇的互动进行了有意识地宣传，在媒体上打造了君臣情谊。有评价认为，佐藤荣作执政时期形成“君臣情义”的局面，不仅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也成为保守政治的精神核心。

1973年，时任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就防务事宜向天皇内奏，天皇对此发表看法，增原惠吉之后向媒体透露了天皇的

意见，引发日本国会轩然大波。此后，内奏和御下问的内容不再对外公开，面对首相的内奏，天皇发表意见也十分谨慎。直至昭和天皇去世前，内奏和御下问一直存在，虽然制度上规定天皇不应参与政治，但在现实生活中，保守派政治家还是有意利用天皇达到其政治目的。

今年天皇的退位和新天皇继位包括年号的更换也反映出这一问题。安倍政府召集一批专业人士，忖度新天皇希望使用的年号。新年号揭晓后，又专门召开记者会对“令和”进行解释，强调该年号是支持日本国民精神的一体感，强调日本主义。此外，新天皇致辞中的一些措辞和前任天皇不同，比如在对宪法的态度上，明仁天皇用的是“捍卫”，德仁天皇用的是“遵照”，对外界猜测内阁在起草该致辞时已包含了要修宪的意图。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保守派政治家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利用天皇的影响力，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以尽管日本战后实行的是象征天皇制，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天皇的政治影响力会被利用，从而发挥相应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胡澎从战时日本女性的角度分析了天皇制。她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女性受到传统和现代双重作用。明治初年，在西方进步思想影响下，日本女性接受了自由民主、博爱幸福、男女平权的思想。同时，以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贤妻良母主义、国家主义等传统因素，也制约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导致日本妇女团体在战时进行协战。

天皇制和父权家长制是规范日本妇女思想和生活的两大支柱。战前接受天皇制教育的日本民族不能平等地看待自

己的国家和邻国，认为其他民族都要服从自己。天皇制思想逐渐在日本社会蔓延，成为当时日本国民最高的行动准则。父权家长制是中国和日本漫长封建时代均存在的传统制约，男性家长靠着绝对的权力统治家庭成员，基于此形成了一种社会统治结构。在日本，天皇和国民的关系类似于模拟的父子关系。所以在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和官方对国民的教化，就是将侵略正常化，对侵略的理由进行包装，从而让他们服从。

明治以来日本统治者一直对天皇制教育非常重视。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在战争体制时期，它对国民特别是儿童思想的影响很深，甚至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教育敕语》颁布后，日本的学校都被要求建奉安殿，供奉天皇和皇后的“御真影”以及《教育敕语》的誊写本。学生和老师每天到校和离校时，要对着“御真影”鞠躬行礼。遇到火灾和洪水等紧急情况，要拼命保护“御真影”的安全。在一些仪式上，要升“日之丸”旗，向“御真影”敬礼，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朗读《教育敕语》，齐唱《君之代》。

《教育敕语》颁布后，小学的修身课非常受重视。文部省于1891年公布了小学修身教科书的审查标准，内容很多都是忠义、友爱、仁慈、义勇、恭俭，教学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忠君爱国的小臣民。1904年开始施行的国定教科书，其中也包括一些信用、自由等社会进步的内容，但它在开始使用时却遭到了批评，比如日本国家主义的教化团体——日本弘道会就批评这类教科书中对皇室和国家的德行涵养不足。为此，文部省1908年开始修改国定教科书。有关

资产阶级道德思想的文章被删除，代之以“皇太神宫”、“国体之精华”、“忠孝一致”、“皇祖皇宗之遗训”等内容，加强家族国家观教育。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天皇制的思想教育已经在教育体系下基本完备了。

战前小学教育是日本国民教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毕业的人数不断增高，女性毕业生的比例也在提高。天皇制的教育对国民的思想有一种禁锢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女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妇女杂志和女子教育中，都将皇后作为国母，作为母亲的象征，要求妇女发挥尊重皇室，加强国家观念的作用。此外，官方妇人团体的成立，有时在宗旨、会歌中也都与天皇制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爱国妇人会的会歌就有“承蒙光辉天地之皇威，时常仰望被朝阳映照之旗帜，怀着一颗报国之心，把女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皇国贡献日本的妇女之道，日本之妇道”的表述。

可以看出，天皇制严重扭曲了人性，摧残了女性的心灵。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的自我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的严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天皇发动的“圣战”的支持。在天皇制的影响下，没有人怀疑天皇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认为天皇尽忠而死是理所当然的。

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田庆立的发言题目是《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处于连接昭和时代及令和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对此前皇室的继承性表现在宫中祭祀、接受“内奏”和“侍讲”以及开展“皇

室外交”等。同时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也具有很多革新性，比如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主动提出“生前退位”、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

通过分析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特征，可以得出若干个观察天皇制的视角。首先是基于比较的分析视角。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同处于日本国宪法一部法律之下，但在象征职责的履行和象征作用的发挥、公务行为的开展上有明显区别。昭和天皇和战前的神权天皇制一脉相承，更多地体现着神秘性和权威性。明仁天皇则更注重行动，更多地体现出大众性和世俗性。从近代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的演进，逐步经历了“神权—王权—人权”的沉降嬗变轨迹，其转折点是昭和天皇战后发表的《凡人宣言》。

明仁天皇是从王权转向人权的核心人物。在 3·11 东日本大地震后，他前往灾区慰问，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些举措对提振日本国民的信心，增加一体感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明仁天皇的“公务行为”开展数量与昭和时代相比显著增多，活动主要是接见、会见和引见、举办茶会等。明仁天皇立足于与国民保持相同视线并为此付诸努力，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与国民直接会面、谈话和握手等，旨在与每一位国民建立“一对一”的纽带联系，从而实现“国民国家”的统合目的。

其次是基于历史分析的视角。昭和天皇曾表示，自己崇拜的是明治天皇，而明仁天皇则表示自己崇拜的是古代的嵯峨天皇和后奈良天皇。嵯峨天皇是日本第 52 代天皇，擅长书法、诗文，被列为平安时代三笔之一。后奈良天皇是日本

第105代天皇，他相当有慈悲心，在发生瘟疫、洪水与饥荒时，都会祈祷人民平安。1984年明仁皇太子在会见记者时表示，那些历史上时常把国民的疾苦挂在心间的天皇，是他学习的榜样。明仁皇太子推崇的天皇制远离政治的文化传统，为象征天皇制应具有的“非政治性”与“亲民性”特征等赋予了历史依据。即位后，明仁天皇基于战争的残酷，深刻反思和平来之不易，从历史上汲取古代天皇制的亲民志向，为象征天皇制注入生机和活力。

第三是基于国际的分析视角。从最初娶了民间的美智子皇后，到后来拥有的国际视野，积极开展国际行动，展现出的国际亲善力，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开放式皇室路线”和“亲民路线”彰显“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这种国际化的路线和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潮流及大众社会的成熟息息相关，也是日本天皇制在现代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焕发生机的具体体现。明仁天皇兼顾了传统与现代，既保留了宫中祭祀、内奏等昭和天皇时代的传统，又寻求自身的革新和突破，在现代化潮流中与媒体进行互动。日本皇室的现代化风气也受到了英国王室等国际王室亲民路线的影响。新即位的德仁天皇就表示，我希望通过始终与人民亲近，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总体上看，“平成风格”主要表现为反思历史、珍视和平，贴近国民、崇尚人权，国际视野、敦行亲善，联袂主导、携手并进，不拘成例、革故鼎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武心波分析了天皇与日本国家自主建构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历史的变迁中，伴随着权威与权力的分与合，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结构”，即一元与二元的周期性交替运行规律。“一元结构”是日本社会“非主流历史结构”，即每当危机临近时，日本会高度地聚合在一起，走向统一。“二元结构”则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历史结构”，一旦外部危机被成功化解，内部的分裂力量就会趁势崛起，将日本再度带入二元生存状态之中去持续其发展。从历史上看，在日本二千余年的历史中，真正处在高度一元化政治状态的时期不到四百年，大多都处在二元分裂状态。这种周期更替主要表现为大化改新一氏族政治的全面复辟—明治维新一战后天皇权威与权力被剥离。

日本的“国家再造”是一个高度一元化的政治进程，从历史结构的周期性演变中不难发现，天皇与日本“国家再造”的一元政治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隐秘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日本从“二元状态”向以国家为指向的一元政治进程的每次转换，都是在作为岛国最大的氏族神（天皇）的带领下完成。要实现国家的再造，就必须让天皇走出皇宫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实现权威与权力的高度合一。

上述奇特现象主要源于天皇与日本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古代日本是由无数氏族部落共同体组成的，而天皇则是融全岛各氏族部落为一体的最大的氏族部落共同体的氏族领袖，是得到神道-神话传统话语体系支撑的“人神”。从社会学角度看，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氏族部落无论其规模多大，其内在的结构都基本相同。这些共同体组织又可以根据“力学原则”和“经济交换原则”进行自由组合，彼此形成

层层递进式效忠关系，一直可以推到幕府，乃至最后达至天皇。由此，具有强烈分裂倾向，貌似散乱的氏族社会在形态上便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变换模式，即大可达及全岛，形成以天皇为首的岛国一元政治共同体；小可分散得四分五裂，形成岛内有国，国中有邦，邦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散乱局面。

当岛国发生内外危机时，社会会自觉与不自觉地产生回归“一元”，建立“大共同体”的强烈要求。此时，政治领袖们的作用就会降低，而传统力量的作用就会得到强化，天皇就会从被“封存”的状态向“开封”状态转变。因此，每当日本由“二元状态”向高度“一元化”的国家转换时，各种政治力量最后都会身不由己且高度一致地回归传统，向具有号召力与统摄力的天皇与天皇制靠拢求援，挟天皇之力实现对“国家的再造”，以摆脱内外危机，寻求新的发展。

日本式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也强化了天皇与“国家再造”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大和民族占日本总人口的99.5%以上，但民族概念却是在近代才在日本形成。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岛民被地理环境和幕藩体制分割得支离破碎，即分属于不同的“藩”中，相互隔离、各自独立。当时日本人所具有的是一种居于狭隘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藩国意识”。日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通过对其最高的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现近代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实现对由氏族部落群体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体验和追随，之后通过整合后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

战后美国对日本自近代以来自建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进行了强行拆除与再造，实行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迫使天皇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只允许其作为日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存在。日本又回到了权威与权力相分离的传统的二元历史结构中。西方出于建立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实际需要，通过制定所谓的“和平宪法”将日本定位在半主权与局部强国的特殊地位上。天皇的被迫退位，导致日本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趋淡漠，难以再对“国家”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忠诚，而是退而求其次地专念于自我栖身之地，如家庭、村落、地域、企业等小集团组织。

随着大国意识的逐渐复苏与觉醒，日本政治家们开始集体不满战后被西方强行改造和安排，试图修改宪法，回归正常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再造日本”。战后日本的“国家再造”迄今为止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中曾根康弘时期提出了“战后总决算”；小泽一郎时期提出了“普通国家论”；小泉纯一郎时期演绎了“狂人/强人政治”；安倍时期提出了“美丽国家论”。

日本政治家深知，国家再造的过程是权力与权威高度合一的过程，没有天皇的参与，要想打造一个被国民发自内心认可和热爱的“美丽日本”是不可能的。为此，日本政治家群体在推进国家再造的进程中，无不对皇宫暗送秋波，对天皇赞美有加，但都因“战后禁区”而不敢公然涉足。2016年7月，NHK播发了天皇退休的消息，8月8日，明仁天皇通过视频发表电视讲话，表明有关退位事宜的个人意愿，日本政府很快表示接受天皇决定。经过近三年紧锣密鼓的准备，

2019年5月1日德仁太子登基，成为新天皇。

武心波认为，日本独特的“历史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日本式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深刻地规定了天皇与“国家再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历史反复证明，在天皇缺位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家再造”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日本正在经历第三次“国家再造”，德仁天皇登基是否意味着这一过程将步入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唐永亮分析了新老天皇更替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虽然战后象征天皇制下的天皇因政治和宗教上的功能被削弱，其影响大不如前，天皇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日本天皇及皇室的对日本社会具有的影响力。

首先，战后日本人整体对于政治有效性的感觉越来越低，对政治普遍不感兴趣。2014年日本人意识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在国会议员选举时，普通国民的投票对国家的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时，表示有非常大影响的受访者占20.5%，而1973年该数据为40%；当被问及会选择哪种政治参与方式时，选择静观态度的受访者由1973年的41%上升至80.3%。可以看出，日本民众对于个人行为会对政治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对于现行的政治运行模式也不乐观。此外，在能力主义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背景下，日本社会多元化日益明显，很少有某个事件能够引起整个日本社会的关心。此次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和令和时代的开启，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无疑是空前的，由此也反映出天皇和皇室在日本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其次，尽管天皇在政治上的作用被宪法大大限制，但天

皇在很多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比如参加宫内祭祀，从日本古神道到现在的神道，具有祭祀功能的只有皇室，这一点是不能被抹杀和替代的。此外，在政府的支持下，皇室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交往，也对日本外交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皇室外交和政治家外交相比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连续性和持久性，能够与某些国家保持较长时间的交往活动，这种特性不可忽视。更为重要的是，当日本遇到百年不遇的危机时，发挥救国作用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天皇，因此有观点认为，持有天皇制和坚守安保体制一样，是日本民族生存不可或缺之国体。

唐永亮指出，尽管天皇与皇室在日本社会仍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未来其发展也将面临一些稳定性的问题。比如作为权威象征的天皇，是否有能力阻挡日本政府的改宪行为，国家运行的二元结构的稳定性是否会受到影响。再比如皇室典范的修改问题。此次修改皇室典范有可能成为未来解决皇室继承问题的突破口，但也伴随着两大风险，一是上皇和天皇关系的微妙化，二是如果生前退位成为常态，也会给皇室继承的稳定性带来影响。

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与现场听众就天皇制相关的内容发表观点并进行深入探讨。

宋成有：战后天皇和日本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有哪些不同点？明仁天皇和德仁天皇又有哪些不同？

真边美佐：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在遵守《宪法》方面没有区别。昭和天皇基本上是对政府的要求原原本本的遵守，

不是特别的去关注国民心情，而明仁天皇相对而言是非常努力的去关注国民的需求，并且在从事相关活动时非常注重国民的感情。战后日本实行象征天皇制，明仁天皇因其个人魅力从而被日本社会和民众逐渐认可。但另一方面，日本国民对于天皇周围的人比如美智子皇后或其他皇室成员，也有了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是批判性的，也可以是表达好感性的。从这个角度看，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一条的确在日本社会扎根了。

李卓：真边美佐老师您认为日本有可能出现女性天皇吗？

真边美佐：刚才在发言中我特别强调了女性的天皇是很可能出现的，但女系的天皇能否出现就不好说了。女性天皇的父亲也是天皇，这在之前是有先例的，但女性天皇的第二代中的女系后代能否成为天皇就不好说了，如何从女性天皇跨越到女系天皇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太会区分女性天皇和女系天皇的区别，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现在像英国的皇室那样出现女王然后出现女系的皇室好象也不错，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出现女系天皇，还不如将天皇制废除。

听众：新天皇的年号“令和”是从日本的典籍里选取的，第一次没有从中国的典籍里选取，以后是否都会从日本典籍里选取？日本对中国的古典是很膜拜的，但现在有很多人却呼吁要疏离中国的古典文化，有意导致双方文化对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敏：令和确实是出自日本的典籍，但在当时是用汉字

写成的，也就是说仍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内，就像汉字文明的领域当中，中国有云南，有西藏，有内蒙，还有其他很多的区域，我觉得是有着同样意义在里面。因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去中文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站在更加广阔视野上来审视。另外日本这几年在学校当中对于学习汉字文化的力度是加大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在会议总结时表示，各位专家学者就日本天皇制发表的观点，使人们对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了解，从而通过天皇这个窗口认识日本社会和国家。今天的发言从政治、社会、历史等方面谈及了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没有涉及经济方面，而皇室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话题。关于天皇的课题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未来随着对天皇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相信我们会创造出更多的概念和属于我们自己的论述方法。